

新旧大陆的历史性遭遇，从来不是纯粹的施暴—受难的叙事图式所能穷尽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殖民者单向给予的问题，哪怕给予的是毁灭与灾难；原住民同样可以反向给予欧洲和殖民者，而且他们的给予有力推动了欧洲和拉美历史的发展。**

暴—受难的叙事图式所能穷尽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殖民者单向给予的问题，哪怕给予的是毁灭与灾难；原住民同样可以反向给予欧洲和殖民者，而且他们的给予有力推动了欧洲和拉美历史的发展。美洲高产作物重塑了亚欧大陆的人口再生产方式和底层的食物结构，贵金属的跨洋流动通过在欧洲造成价格革命而决定性地推进了正在解体中的封建土地秩序与政治秩序的转型，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时代，即资产阶级作为经济主导阶级的时代已然开启，而他们日后进而成为政治主导阶级的时代尽管尚未到来，但已然不可阻挡了。美洲本土的信仰体系、农耕技艺、族群治理逻辑与社会组织模式，持续地与欧洲外来文明交媾融合，最终孕育出独属于这片大陆的、层次丰富的拉美混合文明形态。今天的现代世界体系，正是两种异质文明在暴力博弈、物质置换与文化重塑的历史运动中，相互嵌入、彼此规训、双向重构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原住民绝非被动、失语的苦难载体，而是深度参与跨半球文明格局建构的生动历史主体。

其二，它将殖民苦难简单归咎于殖民者的施虐本能和性格缺陷，变相赦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原罪。这种解读止步于善恶评判的表层，无力追问暴力背后有关资本原始积累与欧洲社会内部矛盾的深层动因。

殖民征服固然在美洲土地上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历史伤口，但殖民者自身也是被他的历史条件所决定所驱动所塑造，或者说，欧洲的征服也是处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它是结构的人质，更是结构的儿子。

1492年一向被西方史学指认为地理大发现的元年，但它更是或首先是持续七百年的欧洲收

复失地运动的余波震荡，是欧洲封建神权秩序落幕、资本扩张秩序崛起的历史性交接。当西班牙人在这一年攻陷了格拉纳达，摩尔人在欧洲的最后一座堡垒，长期依托圣战体系运转的排他性的宗教狂热、庞大的军事贵族阶层和宗教审判体系，突然失去了本土的征伐空间，过剩的暴力势能亟需通过域外扩张完成释放与转嫁。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封锁亚欧陆上商路，欧洲商业资本失去东方贸易通道，香料、贵金属贸易利润大幅萎缩，被地缘格局禁锢的陷入停滞与焦虑的商业资本也亟需向外拓殖。两股同样寻求对外突破的力量迅速完成合流。于是，被资本挟持和驱动、教会背书、军事力量随行，这场于同年启动的所谓地理探险从一开始就背负三重使命：掠夺（贵金属）、传播（基督教）与占领（殖民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一场打着“科学发现”旗号的地理探险，会最终演变为席卷整个西半球的文明浩劫，演变为现代殖民体系与“中心—边缘”的全球资本剥削秩序的肇始。

其三，它刻意回避了前殖民时代美洲原住民社会同样存在族群冲突、阶层分化等普遍性文明矛盾。美洲的人祭现象更不可以用“文化特性”的修辞去消解其残酷性。美洲原生文明并非纯洁无瑕的无异化的乌托邦，它是落

右图：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当年一经上市，旋即引起各界激烈争论。其颠覆性不言而喻，现代西方社会引以为傲的文明先发优势，在这本书中被归因于环境和地理的深刻影响。

